

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



汤用彤论著集之一

中



局

汤用彤论著集之一

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

上 册

汤用彤著

中 华 书 局

1983年·北京

汤用彤论著集之一

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

（全二册）

汤用彤著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20 1/2印张·6插页·463千字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7,500册

统一书号：2018·197 定价：2.40元

第一分 汉代之佛教

第一章 佛教入华诸传说

佛教入华，果在何时？传说纷歧，实难确定。盖佛教自魏晋以后，在中国文化思想上虽有重大影响，方其初来，中夏人士仅视为异族之信仰，细微已甚，殊未能料印度佛教思想所起之作用，为之详记也。汉明求法，见之于牟子《理惑论》，然上距永平之世已过百年。其后乃转相滋益，揣测附会，种种传说，与时俱增。考其原因盖有三端。一者，后世佛法兴隆，释氏信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士，自不免取书卷中之异闻影射附益。二者，佛法传播至为广泛，影响所及，自不能限于天竺而遗弃华夏。因之信佛者乃不得不援引上古逸史、周秦寓言，俾证三五以来已知有佛（参看弘明集宗炳《明佛论》）。三者，化胡说出，佛道争先。信佛者乃大造伪书，自张其军。如《汉法本内传》谓汉明之世，释老优劣即已判明。《周书异记》谓西周之世佛陀应迹，即已震动中华。由此三端，佛教始入汉土诸传说遂少可信。然吾人治史，书卷阙载，原不宜强为之解。而治佛教史，尤当致意于其变迁兴衰之迹，入华年代之确定，因非首要问题矣。兹仅略叙入华诸传说，而加以考定如下。

（一）伯益知有佛

刘宋宗少文《明佛论》曰：“伯益述《山海》：‘天毒之国偃人而爱

人。’郭璞传：‘古谓天毒即天竺，浮图所兴。’偃爱之义，亦如来大慈之训矣。固亦既闻于三五之世也。”《山海经》为禹、益时书，刘歆、王充、颜之推虽传其说，兹姑不论。但天毒偃人爱人之语，见于《海内经》。而刘歆进《山海经》，初只十八篇，其《海内经》及《大荒经》皆进在外，世人早疑其伪。且《海内经》原文曰：“东海之内，北海之隅，有国名曰朝鲜、天毒，其人水居，偃人爱人。”朝鲜、天毒同谓在东海之内，北海之隅，其荒诞无稽，盖亦可知也。

(二) 周世佛法已来

三国时谢承《后汉书》记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，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（见《岁华记丽》卷三），盖以《春秋》是年恒星不见，系应化之瑞相也。实则庄王十年，岁非甲寅。而依今日考证，佛之出世，或更在此后。然佛陀生年，谢承之说或为最早。迨其后释老因化胡之说，互争先后，释伽、老子之生年，乃各愈推愈远，而其瑞应益为神奇。《穆天子别传》（《三宝记》谓齐法上引之），《汉法本内传》，《周书异记》（《续高僧传·魏县谟最传》所引），均上推佛陀生于周昭王之世。唐法琳于武德五年上《破邪论》，中引《周书异记》甚详。其文略曰：

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，江河泉池，忽然泛涨，井水并皆溢出。宫殿人舍，山川大地，咸悉震动。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，遍于西方，尽作青红色。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苏由对曰：“有大圣人生于西方，故现此瑞。……一千年外，声教被及此土。”昭王即遣镌石记之，埋于南郊天祠前。……穆王即位三十二年，见西方数有光气，先闻苏由所记，知西方有圣人处世。……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，暴风忽起，发损人舍，伤折树木，山川大地，

皆悉震动。午后天阴云黑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，南北通过，连夜不灭。穆王问太史扈多曰：“是何徵也？”扈多对曰：“西方有圣人灭度，衰相现耳。”……

《周书异记》自系伪书。而至唐初，乃有所谓道宣律师《感应记》，中载天人陆玄畅来谒律师，言及秦穆公时获一石佛。穆公因污像感疾，以问由余。由余谓周穆王时有化人来，云是佛神。穆王为筑高台作道场。穆公后烧香礼拜，造像立台云云。此所谓穆王时有化人来，乃抄袭《列子》伪书之言，而秦穆、由余与周穆王、苏由相对，其作伪之迹，盖极显然也。又按唐法琳上书驳傅奕有曰：“周世佛法久来，生盲人云，有佛祚短，良可悼矣。”（见《广弘明集》十一）我国反对释教，咸以其能短祚为言。如佛果生于周初，而且已行于中国，则周祚八百岁，可以塞反对者之口。此虽不必为僧人言佛生周初之唯一原因，而后来释子之所以坚执此说，其故想在此也。

（三）孔子与佛

《列子》载太宰嚭问孔子：“孰为圣人？”夫子动容有间曰：“丘闻西方有圣者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”后世佛徒，常据此以谓孔子亦知有佛（《弘明集·后序》及《广弘明集》卷一）。《列子》一书，乃魏晋时人所伪造。而其孔子所称之西方圣者，以至周穆王时之西极化人，亦或指西出关之老子。故六朝人士多不引《列子》以证孔子之尊佛。如元魏之世，道士姜斌与昙谟最争论，斌问孔子既是制法圣人，当时于佛迥无文记，何耶？昙谟答言固未引及《列子》也。刘宋宗炳《答何承天书》，称周孔子佛所未尝言。而牟子《理惑论》亦有尧舜周孔何以不修佛道之问，牟子答辩，固亦未援用《列子》一书也。

(四) 燕昭王

《拾遗记》载战国时燕昭王即位七年，“沐胥之国来朝，则申毒国之一名也。有道术人名尸罗，问其年，云百三十岁。荷锡持瓶，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，善炫惑之术，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，高三尺”云云。按王子年《拾遗记》文原多亡佚，经梁肖綺搜检残遗，合为一部。其所记燕昭王事，不悉是晋代原文，抑梁时改窜。但其所记，《晋书》已称其事多诡怪。所谓沐胥之国，印度无此名称。燕昭王时佛化未出天竺。所谓“尸罗荷锡持瓶指出浮屠”，隐射佛徒已来中国，诚属荒唐不经。按《史记·世家》谓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《封禅书》则谓其信方士，《水经注》亦谓昭王礼宾，广延方士。此均由招贤事附会而来，因是而起种种诡怪不实之故事也。

(五) 古阿育王寺

《弘明集》宗炳《明佛论》，谓佛图澄言临淄城中有阿育王寺遗址，犹有形像承露盘，在深林巨树之下。石虎依言求之，皆如言得。又姚略叔父为晋王（即姚萇，见《僧传·法和传》），于河东蒲坂古老所谓古阿育王寺处，凿得佛遗骨于石函银匣之中。因是宗炳论曰：“有佛事于秦晋地久矣哉。”阿育王者，威力广被于印土，宣传佛法，至为尽力。其后佛书中载阿育王神迹甚多。释教入华，王之声威当与之俱至。《开元录》载：后汉支谶译有《阿育王太子坏目因缘经》一卷，西晋安法钦译有《阿育王传》五卷。晋宋之间，中夏此项传说之记载当亦不少。东晋释昙翼以育王造像布在四方，何其无感不能招致，乃专精恳恻，请求诚应。又释慧达，本名刘萨阿，发愿觅阿育王塔像，礼拜忏悔，自并州南游建业，礼长干阿育王故舍利塔。又至鄞县拜阿育王塔。东西覲礼，屡表征验（上见《高僧传》。刘萨阿事亦

见《珠林》卷十三及三十八，均多怪异，不可信。可见尊崇阿育，至为热烈。而阿育立八万四千塔于宇内之说，亦必风传当世。故临淄、蒲坂地下所得，皆指为阿育神迹。其他如吴孙皓于建业得育王金像（见《珠林》卷十三）。晋犍陀勒知洛阳山中有古寺基墟（《弘明集·后序》）。因宗教之热诚，经好事者之附会，此等故事在社会中流传蔓延，固甚易易。按魏晋佛塔，或原系中国式建筑（见《营造学社汇刊》第四卷第一期刘敦桢复艾克教授书）。掘出基墟，认为古塔，原无足怪。至若金像，秦始皇已有制作，地下枯骨，所在皆有，不必即其所传故事，尽属虚构也。不过阿育造塔八万四千，按诸史实，并无其事。而佛陀造像在育王时，印度尚无其事（说见下）。则指为古寺，必出于教徒迷信，其失实自不待多辩也。

（六）秦始皇与佛教

唐法琳上书驳傅奕（见《广弘明集》卷十一），引释道安、朱士行等《经录》目曰：“始皇之时，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，赍持佛经来化始皇。始皇弗从，乃囚防等。夜有金刚丈六人来，破狱出之。始皇惊怖，稽首谢焉。”按此事南北朝前无人道及。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一始载之，然未言其出于释道安及朱士行《经录》。按道安《经录》如载此事，则僧祐、慧皎等必有称述。至如朱士行《经录》，亦首见《房录》，此前罕有所闻。费长房自言亦未见其书。《三宝记》芜杂凌乱，谓朱士行曾作录，实不可信。其言出道安、朱士行录云云，乃为佛徒伪造。至若释利防来华，梁任公则以为可信，盖谓始皇与阿育王同时，阿育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，或有人至中国（见梁氏近著第一辑中卷第二页）。但阿育王传教虽远及西北，而东北方面则绝无文记。至谓阿育曾派人至缅甸传教，则据今日所知，缅甸距此三百年后乃有佛教（参看 V. A. Smith Asoka. P.

44)。梁氏意似谓佛教在当时经缅甸由海道以传入我国，则亦太远于事实也。又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三十三年有曰：

又使蒙恬渡河，取高阙、陶山、北假中，筑亭障以逐戎人，徙谪实之初县。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（按此文句读颇多异说。一谓“禁不得祠”为一句，“明星出西方”另为一事，但语似不可通。二谓县字与悬字通，而其句读应为“初县禁：不得祠明星出西方”。但《汉书·匈奴传》引此文，谓徙谪实三十四县，则初县系初立之县，而县字非悬字也）。

日人某谓“不得”为“佛陀”之对音，所禁者乃佛祠也（似系藤田丰八之说，但余未见原书）。按“不得”为虚字，非实字，乌能指为佛陀？据近人研究，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。徐广曰：“皇甫谧云彗星见。”今按谧说非也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陈仓有上公明星祠。钱坫曰：“《说文解字》：《甘氏星经》曰：‘太白上公妻曰女媧，居南斗，食厉，天下祭之，曰明星。’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三十三年‘禁不得祠明星’。”又按《诗·大东》毛传：“日且出，谓明星为启明。日既入，谓明星为长庚。”然则《史》言明星出西方，正指日既入之长庚言，其为太白无疑。据《天官书》，太白主兵事，故秦人禁民间私祀。段玉裁注《说文》，谓“天下祭之，盖祀女媧”，亦失之。由此言之，禁不得祠，实与佛教无关也。

又宋宗少文谓三五以来，佛法早已流行，但或散没于史策，或绝灭于焚坑（见《弘明集·明佛论》）。其后佛徒多用其说。即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曰：佛书久已流布，遭秦之世，所以湮灭。此均更荒诞无据，不可信也。

（七）东方朔

释子又常谓东方朔言及劫火，已知佛法。按《汉书·朔传赞》，

谓后世好事者，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。则在东方朔死后，已多恢奇不可信之故事。且《高僧传》载此事曰：“又昔汉武穿昆明池，底得黑灰，问东方朔。朔曰：‘不知，可问西域胡人。’后法兰既至，众追以问之。兰云：‘世界终尽，劫火洞烧，此灰是也。’朔言有征，信者甚众。”然在刘宋时，宗少文乃言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，是言劫烧者非法兰而为朔。然据《僧传》所言，朔并未识劫灰也。

（八）张 騫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言汉武帝时佛法始通中国。并曰：“及开西域，遣张騫使大夏还，传其旁有身毒国，一名天竺，始闻浮屠之教。”查《史记·大宛传》张博望虽言及身毒，然于浮图，则《史》《汉》均未记其有所称述。且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曰：“至于佛道神化，兴自身毒，而二汉方志，莫有称焉。张騫但著地多暑湿，乘象而战。”据此，“始闻浮屠之教”云云，系魏收依通西域事而臆测之辞，并非述騫所言也。唐时《广弘明集》引《释老志》，而改窜此文曰：“及开西域，遣张騫使大夏，还，云身毒、天竺国有浮图之教。”是以魏氏臆断之词改为张騫所说。所改虽微，然道宣引书，往往点窜原文，以证实其所信。名僧如此，则无聊僧人之作伪可知。而其流传之故事虚妄不实，盖亦可知矣。

（九）休屠王金人

《世说·文学篇注》有曰：

《汉武故事》曰：“昆邪王杀休屠王，以其众来降。得其金人之神，置之甘泉宫。金人皆长丈余，其祭不用牛羊，唯烧香礼拜。上（汉武帝）使依其国俗事之。”此神全类于佛。岂当汉武之时，其经未行于中土，而但神明事之耶？

《汉武故事》题班固撰。然与《汉书》绝不同，一览可辨。《郡斋读书志》引唐张柬之《书洞冥记》后云，《汉武故事》王俭造，所记多出入《史》《汉》，而更益之以妖妄之言。故此书或为南北朝作品。其记帝礼金人，显暗指佛教。故刘孝标谓其时经典未行而神明事之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亦有云：

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，至皋兰，过居延，斩首大获，昆邪王杀休屠王，将其众五万来降，获其金人，帝以为大神，列于甘泉宫，金人率长丈余，不祭祀，但烧香礼拜而已，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。

所谓金人为大神，率长丈余，但烧香礼拜云，均隐射金人之为佛像。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所载，均无此语。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仅曰：“其明年（元狩三年）春，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，过焉支山千余里，击匈奴，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。”又如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亦只曰：“转战六日，过焉支山千有余里，合短兵，杀折兰王，斩卢胡王，诛全甲，执浑邪王子，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，收休屠祭天金人。”《魏书》谓昆邪王杀休屠王来降，获其金人。案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获金人在元狩三年春，及秋，昆邪王始来降，则魏收所记已有错误。而列之甘泉宫，烧香礼拜，则全不见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。又按匈奴俗祭天为大事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曰：“岁正月，诸长小会单于庭，祠。五月大会茏城，祭其先、天地、鬼神。秋，马肥，大会蹏林，课校人畜。”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曰：“匈奴俗岁有三龙祠，常以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戊日祭天神。……因会诸部议国事。”据此则霍去病所获之金人，并非佛像而为祭天神主。《史记》谓匈奴单于尝自称天所立大单于，或天地所立日月所生大单于。其称号虽拟配中国之天子，但亦见其俗之敬天也。《前汉书·金日磾传赞》曰：“休屠作金人，为祭天主。”其后《史》《汉》诸家

注解，多以休屠王金人为祭天之主。故裴骃《集解》引三国如淳曰：“祭天为主。”《集解》又有曰：“駉案《汉书音义》（三国孟康撰）曰：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，秦夺其地，后徙之休屠王右地，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，祭天主也。”《史记索隐》引吴韦昭之言亦同。韦昭云：“作金人以为祭天主。”是盖皆以金人为祭天之神主。然三国时张晏乃云佛徒祠金人也，而后魏崔浩亦同此说。如《史记索隐》曰：“崔浩云：胡祭以金人为主，今浮图金人也。孟说（指孟康《汉书音义》）恐不然。案得浮图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。”考汉末魏初，笮融作佛像，以黄金涂之，必颇为当时人所传说。张晏之言，或因此而误断。崔浩则去汉已远，其时佛法兴隆，更易联想及之，其言更不可据。日人羽溪了谛，在大正七年十月发刊之《史林》中，曾著文论及，谓当武帝时代，印度尚未有佛像之制作，休屠金人决非佛像，此实为最有力之证明。又案金日磾本休屠王太子，降汉后，因其国祭金人，故赐姓金（见《汉书·日磾传》）。如金人为佛像，则日磾或奉释教，史书不至全无记载。又甘泉山金人，似有二处，一在甘泉宫，扬子云《甘泉宫赋》有曰：“金人仡仡，其承钟虞兮，嵌岩岩其龙鳞。扬光耀之燎烛兮，垂景炎之忻忻。配帝居之县圃兮，象太一之威神。”盖秦汉宫殿取象天帝之居。故班孟坚《西都赋》曰：“其宫室也，体象乎天地，经纬乎阴阳，据坤灵之正位，仿太紫之圆方。”按天上紫微宫有十二藩，故宫中又常列金人十二，以取则之（《西都赋》又有曰“立金人于端闼”。李善注云：“《史记》始皇铸十二金人置宫中”，又引《三辅黄图》曰：“秦营宫殿，端门四达，以则紫宫”）。观子云赋中所言，甘泉亦效法太一紫宫，且立金人，想亦数为十二，以象十二星宿也。仡仡者，孔安国《尚书传》曰，壮勇之貌也。甘泉金人想顶载钟虞，故称为仡仡。又《太平御览·礼仪部》引《汉旧仪》：“汉法三岁一祭天于云阳宫甘泉坛。”则甘泉更应象天帝之居。据此，金人乃象太一之威神，其非西方之佛也，

又审矣。又甘泉或亦另有匈奴祭天金人，与径路祠在一地。考《括地志》（孙星衍辑本），谓汉甘泉宫在雍州云阳县西北八十里（一作八十一里）。径路神祠，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，本匈奴祭天处，秦夺其地，后徙休屠右地。而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阳县下注曰：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。此休屠金人，无论为霍骠骑所获，或秦朝匈奴故址，然当与径路神祠在一处，距县九十里，与县西北八十里之甘泉宫当无关也（参看《三宅博士纪念论文集》白鸟库吉关于休屠故地一文）。

综上所述：（甲）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并未言及武帝列休屠丈余金人于甘泉，烧香礼拜。（乙）《汉书·金日磾传赞》，有立金人为祭天主之言，其后注解多有从之者。（丙）汉武帝时，印度未有造佛像之事。（丁）金日磾乃休屠太子，无奉佛传说。（戊）甘泉宫乃象紫微宫之十二星。而休屠金人与径路祠则同另在一地。由此五证，《释老志》所言之虚妄可知也。

（十）刘向叙列仙

《世说·文学篇注》曰：“刘子政《列仙传》曰，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。其七十四人，已在佛经。故撰得七十，可以多闻博识者退观焉。如此即汉成哀之间，已有经矣。”据清王照圆校《列仙传》有七十二人，上文“撰得七十”乃“撰得七十二”也。又上文谓乃自《列仙传序》略出。故刘宋宗炳《明佛论》有曰：“刘向《列仙叙》：七十四人在佛经。”此序又称为赞，《颜氏家训·书证篇》有云：“《列仙传》刘向所造，而《赞》云七十四人出佛经。盖由后人所属，非本文也。”南宋时志磐谓其所见之传犹有此语。但佛经已改为仙经（详《佛祖统记》卷三十四）。而现在通行版本，则已无七十四人出于佛经或仙经之语。盖此书曾历经道士改窜也。

第二章 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

永平求法之传说

汉明帝永平年中，遣使往西域求法，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入中国之始。兹据南朝前之记载，先分疏其事迹，再详论此传说之真伪。

依今日所知永平求法，最早见于《牟子理惑论》（载于《弘明集》），《四十二章经序》（《祐录》六载六），及《老子化胡经》（《广弘明集·笑道论》第十四）。此外石赵时王度《奏疏》（《高僧传·佛图澄传》），东晋袁宏《后汉纪》（卷十），刘宋宗炳《明佛论》（《弘明集》），范晔《后汉书》（卷百十八），南齐王琰《冥祥记》（《珠林》卷十三），萧梁时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（卷二），慧皎《高僧传》（卷一），陶弘景《真诰》（卷九），北魏酈道元《水经·穀水注》，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（卷四），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，以及元魏僧徒所伪造之《汉法本内传》（见《法苑珠林》《广弘明集》及《佛道论衡》等。《续论衡广》引其文）。其余六朝人士言及之者，尚不乏人。

东汉末牟子作《理惑论》，凡三十七章。其第二十章，述汉地始闻佛道。兹录其全文，并附以他书所载异说。

昔孝明皇帝，

按各项记载均不载年月。仅《化胡经》谓永平七年遣使，十八年还。《法本内传》作三年感梦。而《广弘明集》卷一所引之《吴书》谓在十年。隋费长房《三宝记》作七年感梦，十年还汉。并引陶弘景《帝王年谱》（《隋志》著录）称十一年梦金人遣使。梦见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飞在殿前。

按《四十二章经序》作身体有金色，项有日光。《化胡经》：长丈六尺，项有日光。袁宏：梦见金人长大，项有日月光。范晔：金人长大，项有光明。王琰：形垂二丈，身黄金色，顶佩日光。慧皎：夜梦金人，飞空而至。酈道元：梦见大人，金色，顶佩白光。杨衒之：帝梦金人，长丈六，项背日月光明。《释老志》：项有白光，飞行殿庭。

欣然悦之。明日，博问群臣：“此为何神？”

按《真诰》略同，《经序》有“意中欣然，甚悦之”。徐均无此句。有通人傅毅曰：

按《经序》、《化胡经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释老志》均同。徐仅作“或曰”。

臣闻天竺有得道者，号之曰“佛”，飞行虚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将其神也。

按《化胡经》，毅对曰：“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号。”（一本号下有佛字，此处疑有脱误。）王浮盖虚构事实，谓释迦于汉代乃成道也。其余各书，均略同牟子所记。

于是上悟，遣使者张騫（酈本据晚出传说改此四字为中郎蔡愔。此依宋元明官本。《世说》注引《牟子》无张騫名）、羽林郎中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，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。

按《经序》、《真诰》略同。惟“羽林郎中”，《序》作“羽林中郎将”。余多仅言遣使，不书人名。南齐王琰谓使者只蔡愔一人。《祐录》七，王僧孺《慧印经序》曰：“王遵之得《四十二章》。”《僧传》求法者为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，《释老志》从之。《真诰》原注有曰：“遣侍中张堪或郎中张愔，并往天竺，写致经像，并沙门来”云云。至若《后汉纪》，则不言遣使，仅谓明帝问其道术（《御览》引《袁纪》则言遣使天竺，问其道术，恐

系后人增加)。《后汉书》则谓遣使天竺，问佛道法。《化胡经》所载独不同。其言曰：“明帝即遣张騫等穷河源，经三十六国，至舍卫，佛已涅槃，写经六十万五千言，至永平十八年乃还。”盖谓佛在汉时成道，于明帝世入灭。因浮图既后于老子，则化胡之说有根据也。

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。

按《牟子》不记迦叶摩腾等随蔡愔来华事。《四十二章经序》、《化胡经》、《后汉纪》均同。至南齐王琰《冥祥记》，始记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佛像至。《高僧传》从之，唯作摄摩腾，《释老志》同。

又有可注意者，《牟子》言于大月支写佛经归，藏在兰台第十四间。《经序》略同。又《祐录》二，首言张騫远使西域，于月支写经四十二章，次又言于月支遇沙门竺摩腾，译写此经还洛阳。均谓经系译于月支。《水经注》曰：“发使天竺，写致经像，始以榆欐盛经，白马负图，表之中夏。故以白马为寺名。此榆欐后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。近世复迁此寺。”《伽蓝记》曰：“寺上经函，至今犹存，常烧香供养之，经函时放光明，耀于堂宇，是以道俗礼敬之，如仰真容。”

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。

按《经序》作“起立塔寺”，亦未言及寺名。王琰乃言及白马寺。《僧传》则更言外国有白马，绕塔悲鸣，故寺多以白马为名。《水经注》、《伽蓝记》均谓白马寺在西阳门外。西阳一名雍门，乃洛阳西门之一也。又按白马寺之名，始见于西晋竺法护译经诸记中。太康十年(公元289年)四月译《文殊师利净律经》，十二月出《魔逆经》，均在洛阳城西白马寺(均见《祐录》七)。永熙元年(公元290年)译《正法华》，亦在洛

阳白马寺(《祐录》八),上距汉永平之世已二百余年。《牟子》虽未载寺名,然地望恰合,则应亦指白马寺。又按竺法护译经,常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(《须真天子经记》,见《祐录》七)。东晋时支道林常在建业白马寺。则汉晋间寺名白马,或实不少。《名僧传·目录》称摩腾等住兰台寺,则显由藏书石室之说而来。

于其壁画,千乘万骑,绕塔三匝。

按《经序》无此句。《僧传》白马绕塔悲鸣,或与此传说有关。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。明帝存时,预修造寿陵,陵曰显节,亦于其上作佛图像,时国丰民宁,远夷慕义,学者由此而滋。

按《经序》无此段。《后汉书》《后汉纪》均仅有于中国图其形像之语。《冥祥记》、《高僧传》均有之,并谓原来佛像是优填王所作(《高僧传》作“倚像”《魏书》“立像”)。

又按《高僧传》一《竺法兰传》,谓竺法兰与摩腾俱至雒阳:“译《十地断结》、《佛本生》、《法海藏》、《僧本行》、《四十二章》等五部。移都寇乱,四部失本,不传江左,唯《四十二章经》今见在,可二千余言,汉地见存诸经,唯此为始也。”至若《祐录》卷二则不载竺法兰之名,并未著录其所译之经。

综上所述,永平求法传说,盖可分为三系:(一)《牟子》系。此以《牟子理惑论》所言为最早(《四十二章经序》或更早,说见后)。《四十二章经序》与之大同。晋袁宏、宋范晔或采此说。梁陶弘景之《真诰》则直抄《经序》之文。此系记载谓汉明感梦遣使,于月支写经而归,并图佛像。考《水经注》、《伽蓝记》均未载摩腾等在洛阳译经之事,二书均详叙赉经回华之榆樛,似亦谓经译于西域,故亦可入此系。(二)《化胡经》系。此据求法之说,属入佛陀成道涅槃之年,以证其